

「澹王之春」撰 趙春晨 曾三陶 岑生平

王之春集 ①

湖湘文库編輯出版委員會 岳麓書社

〔清〕王之春 撰
赵春晨 曾主陶 岑生平 校点

王之春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王海东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世界局势风起云涌。在西方，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电气的运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也加快了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侵略的步伐。在东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成为东方强国并不断威胁着它的邻邦。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积贫积弱，日趋衰竭，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内忧外患，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形成了一场促使中国社会转型的洋务运动。王之春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一度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王之春的生平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号椒生，湖南省清泉县（今衡南县）泉溪镇狮子坪人。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1841年1月11日）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卒，具体时间不详，葬于本县之杨柳河黄屋山。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祖与王之春的十四世祖为同怀兄弟，因此王之春称王夫之为“七世祖船山公”。

王之春出身文童，“少为名诸生”（李元度《椒生诗草》序），青年时期尝投都中为书吏。咸丰年间入湘军，参赞霆字营戎幕，

后隶彭玉麟部，擢为通判，同治八年（1869）曾刊刻陈弘谋《陈文恭公书牍》于直隶幕次。王之春久历兵戎，“以文人亲武事”，“交游最广、阅历最深”（周寿昌《椒生随笔》序），其才干受到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楨等湘淮大吏的赏识。

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王之春率军驻防于北塘海口和江苏镇江一带。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侵略台湾，王之春心中悲愤交加，有“棘手多时夷性狡，填膺有憾海风腥”（《椒生诗草》卷三）之慨叹。为了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他根据当时民间流传的无名氏抄本《英夷入寇记》（实系魏源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改编点定，以《防海纪略》之名刊行。此书虽非王之春本人所著，但经他改编刊印，有利于这部爱国主义信史的流传，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起了积极的作用。

光绪五年（1879）左右，王之春又编成了《国朝柔远记》二十卷初稿。记述清代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间中外交涉的历史，介绍世界各地的概况，阐述自己的洋务思想和主张。书成之后，颇受洋务派人士的重视，虽未付印，而“索阅者多，苦不暇给”（《国朝柔远记》自序），“谈时务者奉为圭臬”（李元度《椒生诗草》序）。光绪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吃紧，日本乘机在这一年正式宣布吞并琉球，威胁我国的东部海疆。为了掌握日本的动向，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楨决定派人赴日本“察其情形”，一向留心中外交涉事务的王之春正膺其选。王之春日本之行往返三十余日，游历长崎、横滨等地，多有所得。归国后，向朝廷“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率锐师规复中山”（李元度《椒生诗草》序）。王之春将日本之行的所见所闻编撰成书，以《谈瀛录》之名于光绪六年（1880）刊刻行世。彭玉麟称该书“言简而意赅，俾日国情形一翻阅而了如指掌”（《谈瀛录》序）。

光绪十年（1884），王之春奉调赴粤，先后担任雷琼兵备道、高廉兵备道。时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王之春曾联络郑观应往说泰国夹攻法国，因故中止，后又参加了中法双方勘议中越界址的工作。在交涉中，“法人于钦防以西诸地啧有歧辞”，王之春“坚持旧址，证据明确，诘折夷使不少假借，使臣赖之”（樊恭煦《国朝柔远记》跋）。不久，王之春升任广东按察使，并署理广东布政使。

光绪十七年（1891），王之春在署理广东布政使任内，代替巡抚刘瑞芬接待来华旅游的俄国沙皇世子尼古拉二世。因为有这么一种关系，光绪二十年（1894），他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奉派出使俄国，吊唁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逝世，并恭贺新皇尼古拉二世嗣位。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王之春此行似有“借俄人之力以制倭人”的政治意图。王之春此行游历了英、法、德、俄诸国，“周阅工厂，访其政制，察其异同”，增长了不少洋务新知。当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人士激烈反对，王之春奉命再与俄、德、法三国交涉，使三国联合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光绪二十一年（1895）回国后，他向朝廷提出了自强新政主张八条。王之春对欧洲四国的考察，以日记形式记载，以《使俄草》之名于同年刊行。回国后不久，王之春又有使俄之命，在鄂候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清廷收回成命。

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之春调任四川布政使，镇压了余栋臣起义。二十五年迁升为山西巡抚，次年调安徽巡抚。光绪二十七年开缺，光绪二十八年（1902）调任广西巡抚。时广西农民起义烽火四起，传闻王之春主张以出让广西铁路和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兵法款以平内乱”，从而激起国内民众的抗法运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王之春被革职，待罪京师，后移居上海。

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1903年11月19日），爱国志士万福华在革命党人黄兴等人的影响下，于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一枝春番菜馆持枪行刺王之春，未遂。万福华被捕，受牵连入狱者有黄兴、章士钊等十余人，成为轰动一时的“刺王”事件。此后，王之春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回乡静居直到去世。

二、王之春的著作

4 王之春一生勤于著述，周寿昌称他“笔墨不离左右”（《椒生随笔》序）。传之于世的著作有《谈瀛录》三卷，《国朝柔远记》二十卷，《使俄草》八卷，《椒生随笔》八卷，《椒生奏议》五卷，《椒生诗草》六卷、《续草》九卷，《船山公年谱》二卷。本书汇集了《椒生奏议》、《谈瀛录》、《国朝柔远记》、《使俄草》和《椒生随笔》五种。

《椒生奏议》五卷，扉页题《王大中丞椒生奏议》，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通俗报馆刊本。奏折起于光绪己亥（1899）四月二十日，止于光绪辛丑（1901）八月初九日。中日甲午之战以后，中国已有被帝国主义瓜分之势，“以致数年间，俄踞旅顺，英要威海，德占胶州，法躏广州湾，倭索福建各埠，即弱小之意大利，亦垂涎于三门岛”（见《椒生奏议》卷一）。国家处在“外侮迭乘、创巨痛深之际”。光绪庚子、辛丑间，发生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震惊中外，清廷被迫西迁西安。身为安徽巡抚的王之春，实际已处于事件的漩涡之中，其奏议几乎涉及到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从其奏议中，可以看出晚清政治的黑暗与腐朽，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积弱与贫穷，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为改变落后挨打局面而做出的努力，还可以

看出王之春作为一位洋务派代表人物为国家富强所作的思考。《椒生奏议》的内容包括这期间安徽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的各方面。由于安徽处在长江中下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其时发生在安徽的大事，无一不受全国政局所波及，也无一不波及到全国的政局。所以王之春的奏议，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国朝柔远记》二十卷，有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刊本，为本集底本；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北书局重刊本，为本集参校本。又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日新社石印本和同年上海申昌社石印本。各种石印本书名或作《中外通商始末记》，或作《国朝通商始末记》，或作《各国通商始末记》，或作《通商始末记》。该书前十八卷为正编，以编年体形式叙述清代顺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三年（1874）二百多年间中外交涉的历史，以及清朝同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若干史事；后两卷为附编，包括《瀛海各国统考》、《蠡测厄言》、《沿海形势略》、《环海全图》、《三岛（台湾、澎湖、琼州）分图》等。该书取材十分丰富，除汇集有关上谕及颁发官书外，并搜录当时诸臣奏疏、名臣撰述、西人图志及各家著述可采掇者。“间有得之闻见者，要必采访确实，不敢稍涉虚诬。”（《国朝柔远记凡例》）该书条目清晰、知识广博、文字精练，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其中《蠡测厄言》十三篇，是作者洋务思想和外交主张的集中论述。该书成书于清光绪五、六年之间，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为了解和研究清代中外关系必读的书籍之一，也被“谈时务者奉为圭臬”（李元度《椒生诗草》序）。其中《蠡测厄言》等篇，在清末亦曾单独出版发行，足见影响之广泛。

《谈瀛录》三卷，光绪六年（1880）上海文艺斋刻本，为本集

底本，卷一、卷二为《东游日记》，卷三为《东洋琐记》。又有四卷本者，则析第三卷《东洋琐记》为上下两卷，同年刊刻于京口营次。《东游日记》是王之春于光绪五年冬赴日本考察的日记，起光绪己卯（1880）十月十八日，由镇江防营搭轮启程，止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抵镇江防营”。途中兴之所致，发而为诗，诗作附在事件之后，共65首。《东洋琐记》是考察归来后，对日本的情况作较为系统的介绍，“条列详志之”。其内容涉及日本的方位、疆域、政区、险要、户口、兵额、官制、田赋、杂税、国债、教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谈瀛录》是我国最早较全面介绍日本国情的著作。在此之前，虽有罗森的《日本日记》（1854）、何如璋的《使东述略》（1878），但《日本日记》仅发表于香港英华书院的1854年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内地罕见。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是其出使日本的正式报告，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1935年才有家印本。与《谈瀛录》同时的还有两种介绍日本的文献：一为王韬的《扶桑游记》，一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扶桑游记》于光绪五、六年间刊于日本；《日本杂事诗》虽有光绪五年冬刊本，但黄遵宪本人对此刊本并不满意，此后数度修订，直到光绪戊戌间（1898）才有定本。而王之春将《谈瀛录》及时刊刻，并同时发行两个版本，又有位高权重的彭玉麟作序推荐，称“《谈瀛录》所谈，诚防日以防俄之秘钥，亦服日以服俄之韬铃也”。当时知名学者王先谦也大肆赞许：“《谈瀛录》三卷，文赡而事核……异日从事东方者，宜于是书有取焉。”

《使俄草》八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文艺斋刻本，为本集底本；同年又有石印本行世。《使俄草》记王之春专使赴俄国以及欧洲之行，起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止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七日。书有凡例，称“是编于西学之源流，山川之险易，

民物之简蕃，风俗之殊变，军械之更新，随得随录”。又称“是书于朝绅宴会、官眷茶会，及乐、戏、跳舞各节，罔弗登记”。甚至包括对国名、地名和人名之考释、天气之变化、行程之远近迟速，等等。特别可贵的是当时西方对中日战争的评价，日记中亦有摘录，“义在有所不避”。途中所作的诗歌，亦随录于当日的日记中，共计诗作 135 首。王之春在俄国期间，除拜会俄皇尼古拉二世并递交唁、贺国书外，同俄国政府高级官员和英、法、奥、意各国驻俄公使多有交流，通过一番努力，使俄国有“为我国家协助之意”。王之春在俄罗斯参观了皇宫、教堂、铸钱局、博物馆、监狱、蜡人馆、造炮厂、造船厂、水师学堂、图书库，甚至参观了滑冰场，还参加了一场婚礼。在德国，王之春考察了伏尔铿船厂、鱼雷厂、伯虏克炮厂。王之春在此行中，十分关注欧洲科技的新发展，除对迅速发展的铁路运输有专门考察外，还对正在兴起的电气学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他在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西人电学日精一日，将来用法尚多，层出不穷，真有意想不到者。中国诸物废弛，火轮车路尚未筑造，而西人已改弦更张，几于不可知之之谓神。然则讲求一切，其尚可缓乎？”王之春此行还关注到了法国的潜艇试验，“有船名居斯带佛然覃者，能在海底行走，昨特演于大澳之中，当其伏水时，船中水手依然极有生机，每钟速率约行八海里又百分里之十，或百分里之二十九，其储电各器，又极得法，行驶试演毫无火星之漏”。王之春对欧洲的考察，关注的目光从科技、军工等技术领域扩展了对社会、对政治制度的考察。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王之春在对法国政治仔细考察后，有一篇按语云：“凡欧洲各国……其在官者，皆民之望，即榷征税饷，具有常度，涓滴必归公款，不得朘民为生。其所谓库臣者，不过综厥大纲而已；其所谓理财者，不过司出纳

掌簿录而已。而所谓因循蒙蔽、侵冒剥蚀，干没克扣之弊，彼返无之。凡泰西各国，大都如此，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通过诸多事实的见证，王之春有“安得不谓泰西政治立法之善乎”的慨叹。由此看来，《使俄草》所带回的资讯，不仅突破了王之春往日的视野，也冲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固有藩篱。

《椒生随笔》八卷，光绪七年（1881）上海文艺斋刻本。随笔是笔记性著作，笔记之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清人笔记甚多，但清代湘人笔记却很少。来新夏先生《清人笔记随录》著录清人笔记210余种。湘籍学者所撰笔记仅有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一种。《椒生随笔》是王之春早期作品，书首有光绪三年九月自序，知该书是作者读书笔记，“随得随记”。所记内容虽然偏重于清咸、同间名人逸事、诗词联语，也有不少条目具有史料价值，甚至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带肚”云：“又有一种长随，名为带肚人家。当本官未经得缺之先，常代借银两，并言明得缺后，即派充门丁。需资人员往往嗜其小利，一经任用，则蒙蔽招摇，无所不至。本官受其挟制，平民被其讹索，实堪痛恨。”“近日宦场枯窘，求带肚而不得者多矣，遑论严禁耶。”又如：“论捻”、“戒洋烟诗”、“海运”、“电报”诸条，是关注时务所得。本书有周寿昌、祝松云序各一篇，周序称该书“讲学则具有渊源，考典则直探原本，论诗则力宗风雅，序事则务规切近”。周寿昌的评价显然有过誉之处。

三、王之春的洋务思想

王之春早期具有传统的经世思想，他在《陈文恭书牍序》中说：“春束发以来，喜读切近之书。稍长，奔驰戎马，暇则取名臣

言行暨经世论治等书奉作圭臬。”时论称其“旧学衍船山一脉”（祝松云《椒生随笔序》）。王之春的洋务思想则形成于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

《椒生随笔》成书于光绪三年以前，这部书于西学少有提及，仅在第八卷提到了“电报”、“罡风匣”（魔术）、“地形如肺”三条，而此前发生的“鸦片战争”、出现的“坚船利炮”，以及已经创办的洋炮局、制造局、船政局、机器局等，王之春似乎视而未见，说明他当时关注的重点尚未在洋务方面。

发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日本侵略台湾和光绪五年（1879）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对王之春刺激很大，此后他再没有写“随笔”了，而是将精力转向关注时务，尤其关注对日本的研究。王之春日本之行，改变了他对日本的许多看法，也改变了他作为湘军高级将领的狂妄心态。他不仅从文献上或与日人交谈了解到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而且亲眼看到了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如：“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达时务，以公是非。其有毁谤朝政，及诋毁人过者，轻则罚醵，重则监禁，盖仿西法之善者。此外如电线局、郵便所、火车等事，莫不一一规仿西制。”甚至“近驭马车者，皆剪发着西服，意气扬扬，若自得者也”。王之春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日本民族，而没有考察过日本的湘军将领们仍然是不可一世的姿态，彭玉麟在为王之春《谈瀛录》作序时甚至说“虾夷一岛，直以靴尖踢倒耳”。看到了日本，才知道差距，王之春从此成为洋务派的鼓吹者。

最能体现王之春洋务思想的是《蠡测厄言》，这篇附在《国朝柔远记》之后的文章，阐述了中国自强的十三条途径。即：慎约议、联与国、广学校、精艺术、固边圉、修船政、兴矿利、防漏税、强兵力、练民团、禁贩奴、编教民、论鸦片。这些主张在当

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如王之春主张同外国修订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在中国享受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及领事裁判权、提高外国商品人口关税等等。这些主张在洋务运动中部分得以实现。

王之春在对俄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考察之后，又提出了洋务必不可缓者八端：即开拓铁路、变革军制、变通科举、造就人才、善筹款项、讲究工商、振兴矿务、专使交涉。王之春将此八条上奏朝廷之时，态度已十分坚决。他说：“臣此次奉命出使俄国，兼历英、德、法各都，周阅工厂，访其政制，察其异同，窃以为彼皆日新月异。环匝四邻，我当新创之余，断不能不损益旧制，参访新规，冀可骤复已亏之元气，弭将来之祸萌。”王之春明确提出了“损益旧制”的主张，认识已超出一般洋务派的观点。

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王之春痛心疾首。他认为此次变出非常，“推其致此之由，皆缘于洋务一事人多视之甚轻，言之太易，一旦事变之来，遂无所施其补救”。于是王之春在光绪辛丑（1901）四月八日，又向朝廷上了《条陈洋务事宜折》，再次提出了当前洋务急办的八件事情，即“新八条”：设洋务馆、设储才馆、多派干练人员亲往游历、多选聪颖生徒出洋游学、精选使才出使绝域、慎选章京、设译报馆、广译群书。同一天，王之春还上奏了《覆陈政要大纲四条折》、《广设算学专门学堂折》，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洋务新主张。

但是，王之春的洋务思想也有局限，“西学中源”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对西方科技以及其他文明成果的学习。他甚至认为“彼西人所谓为绝学者，皆不能出吾书”（《使俄草》卷二）。他看到西方的科技成果，总要牵强附会地从中国典籍中寻找证据。当然王之春“西学中源”的观念一次次被突破，甚至“西学中源”成为一件仅遮风雨的外衣。如谈到通商一事，王之春说：

“通商非西制也，亦非新法也，中国古时盖有行之者矣。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此通商之滥觞。”但王之春立即以当今各国通商情况加以比较，说：“今五洲各国皆以通商为立国之本，保护之，补救之，不遗余力，有事亦可借商人之助，而商人亦乐出其余力，以佐公用，故事无不举。”接着王之春开始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批评：“我中国独守前规、不思振作，何怪洋货之进口者年盛一年，土货之出口者日少一日，坐使银钱流入外洋，俾国中日趋贫困而不觉，此西人所哂笑其旁，而或莫悟者也。”因此王之春提出要设立商务衙门，与总理衙门相表里。王之春的“西学中源”论，往往也表现得如此软弱无力。

王之春一向以爱国者自居，他甚至曾设想带一支队伍偷袭日本，以解心头之恨。但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镇压广西农民起义时，传闻有“借法兵法款，以平内乱”的设想，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抗法”运动而被革职。虽然事后清廷否认政府与闻借兵法人之事，王之春却终究落得声名狼藉，险些被刺杀。王之春以静居乡下的方式在政治舞台上谢幕，革命的洪流最终淹没了这位洋务运动的守望者。

本集中的《国朝柔远记》由赵春晨点校，《使俄草》由岑生平点校，《椒生奏议》、《谈瀛录》、《椒生随笔》由曾主陶点校。曾主陶统阅全集。

曾主陶

二〇一〇年五月

目 录

椒生奏议

椒生奏议卷一

谢赏黄马褂折	3
谢升山西巡抚折	3
奏为强邻日逼亟宜练兵筹饷谨陈管见折	4
接皖抚篆折	9
发北京总理衙门电	10
请展办皖省振捐折	11
复洋货税厘并征折	12
募兵筹饷折	14
遵部议筹款折	16
汇解洋款折	18
发京都总署电	19
发京都总署电	20
发京都总署电	21
拿办会匪保奖折	21
调李定明萧镇江差遣片	23
请复彭广心片	23
增兵拨饷折	25